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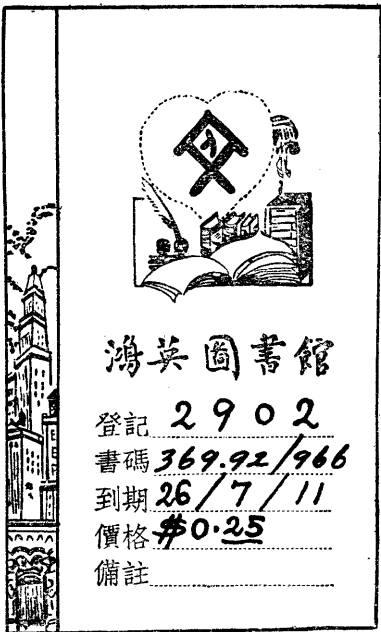
書叢題問洋平太 552

中國 經濟情勢

西流編譯



亞東圖書館印行



鴻英圖書館

登記 2902

書碼 369.92/966

到期 26/7/11

價格 \$0.25

備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6133B



~~1527669~~



書叢題問洋平太

勢情濟經的國中

譯編流西

行印館書圖東亞



有 所 權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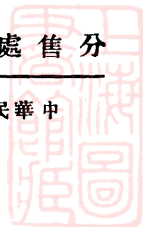
勢 情 濟 經 的 國 中

分 五 角 二 價 實

館 書 圖 東 亞 所 行 發
市 中 路 馬 四 海 上

店 書 大 各 省 各 處 售 分

版 出 月 四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目次

中國的經濟情勢（北平中國經濟研究所）

A 恐慌的第四年

B 饑餓與農民大眾的不滿

C 都市中破產者之繼續出現

D 中國經濟之向日本屈從

E 列強資本的輸出戰

F 白銀恐慌的尖銳化

G 中國的經濟恐慌與銀行的農村放款

中國與白銀問題（阿爾庫斯）



中國的經濟情勢

北平中國經濟研究所

(最近一年間幾個重要的經濟問題)

A 恐慌的第四年

從生產，物價及商業交易的指標看來，中國的經濟恐慌，在一九三四年，比之上年是更加激化了。

(1) 一九三四年度的農業生產，因為旱災及洪水的影響，比之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三年，各減少了二分之一及三分之一（參看第三項）。一切產業，都捲入關閉及『減工』的狂潮之中，故生產是愈加低下了。民族工業



之根幹的纖維工業，都在一般衰頹的情況下苦戰惡鬥以求維持牠的生存。上海的紡織工場及橡皮工場等類的輕工業，都各自崩潰，纖維工業生產率的減低，可由下表看得出來。

紡織工場的生產

	棉紗(千捆)	人工數
一九三二——三三年	二,二八四	二九,一六七
一九三三——三四年	二,三三三	三五,七五六
一九三三——三四年	二,二七三	三三,七六一

生絲，水泥，火柴及其他的工場的減工率，達到四〇——五〇%。佔中國輸出品之大宗的生絲，其生產，差不多在休止的狀態之中。

工場的活動狀況

從事生產的比例(%)

從事生產的比例(%)

纖維工業	七	毛織物	望
水泥，帽業	七	淡氣	四〇
化粧品	壹	橡皮	三
染業，製罐業	六	鐵	三
油漆	壹	生絲	二〇
火柴，玻璃	五		

(上表根據一九三五年一月號

“The Lead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一〇八頁。)



(2) 物價的下落，就說明了一九三四年恐慌的深刻化。商品物價，一般的都跌落了，而輸出商品，則特別顯著。但輸入商品反有幾分騰貴了。輸出商品物價的下落，竟達輸入商品的騰貴之二倍，這就是帝國主義者把恐慌的重擔轉嫁到殖民地的最好例證。

一九三四年的物價指數（以一九二六年為一百計算）

	一月	四月	七月	十月	十二月
上海批發物價	九七·一	九四·六	九七·一	九六·一	九九·〇
華北批發物價	九二·六	八九·一	九〇·九	九二·三	九五·〇
上海輸入物價	二七·一	二九·三	二三·九	二四·一	二五·〇

物價的變動，在上年第一個四分之一年中就看到的，到八月以後，才

稍有上昇的傾向。這個騰貴的傾向，乃是由於稅率的增加，國外貿易的統制，統稅的賦課，膨脹傾向的增加等原因而起的，而棉紗的騰貴，是由於輸入稅率增加因之原棉騰貴而來。至於輸入的金屬物，也是同樣的。但是若從國內商業與對外貿易的不振，以及商店的繼續破產看來，縱令現在物價更能騰貴一點，但對於大眾購買力的增加上，是不會有若何效果的。而且除米以外，一切的農產物價，都暴落了。

(3) 在商業上，恐慌也有進展的傾向。一九三四年中國國外貿易總額，是十五億六千四百萬元，較之一九三三年減少二〇・〇五%，較之一九三一年減少五七・一八%。入超正是五億元。

國內商業之繼續萎縮，可以由席卷全國的破產狂潮來說明（參看第四

項)。

若把經濟情勢，加以全體的觀察，則一九三四年中國的全工業部門，特別是帶有近代設備及近代經營方法的部門，較之一九三三年，是遠為衰落了。紡織業與麵粉業所受的打擊，簡直是難以計算的。例如握有全國生產五成以上的紡織大王榮宗敬，他的申新九廠，就因為破產而關閉，不得不交給銀行去拍賣。上海的恆豐紡織廠及浦益紡織廠，也蹈了同一覆轍，還有許多紡織廠破產的消息，都從全國各地傳報出來。例如天津的恆源，北洋，裕元，鄭州的豫豐、蕪湖的裕中等廠是。

但是，日本的紡織工廠，無論在上海或中國其他各地，都有長足發展的氣象。一九三四年，日本在華北的紡織工廠，獲得八百十六萬元的利潤

(The Shanghai Evening News,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日本紡織業的

任何工廠，都因擴大生產，而增加了資本（特別是青島）。

一九三四年上海棉紗交易的總額，較之上年雖稍有增加，但較之一九三〇年，還不及一半。棉紗的價格，雖亦因上述的原因騰貴了一些，但中國的紡織工廠，已在此以前，就破產了。

麵粉業也遭受同樣的命運。中國人的工廠，到處失敗。上海的福新工廠是中國最大的麵粉廠，其生產額佔全麵粉業之八成，已於上年七月關閉了。有三十年以上歷史的淮陰大豐工廠，與上海的華豐，也同時倒閉。與米及其他穀物相反，中國的小麥粉，也有下落的傾向，這個傾向自上年十月以來直到現在，還愈加激化。生絲的生產，如上所述，在這一年間，差

不多完全在停滯的狀態之中，現在上海還在繼續工作的，不過三個公司而已。我們若一想到上海是中國繅絲業的中心，在繁榮的時期，僅就閩北說也有一百以上的絲廠，那我們就知道目前的絲業，是怎樣一幅暗淡的氣象了！這是除絞殺產業戰鬥力以外別無效用的絲業統制政策之直接結果。

在工業一般衰頹時代，資本的攻勢，加在勞動階級的身上，乃是當然的事情。本來就低微的工資，經過這一進攻，自然更加低微了，上海絲織業減低了一五%（上年五月）華北礦山減低了三〇%（上年九月），只要看這兩個例子，便可察知其他。陰歷正月以後，上海紡織業主的減低工資計劃，惹起了三萬工人猛烈反對。一位資產階級的學者陳氏，他把這種資本的攻勢，說是『全國僱主參加減低工資的競爭』（民族雜誌一九三五年一月

號)。關於大量的失業及勞動的移動，雖不能得到正確的統計，但有許多工廠，把就業者的半數，都趕到了街頭。任何資本家把年底賞與金和房米貼都減低了，因之工人工作的安全，已完全沒有了。因旱災而瀕於饑餓的農民，無論男女老幼，都悲慘的流入都市以圖糊口，所以資本家很容易把那些常僱的工人辭卸，代之以更賤價的新來的農民。上海申新九廠，便是最好的例證。牠把工人一批一批的解僱，而從『難民救濟會』裏召收許多人來以代替工人。以前工人由契約的束縛，在三年之間，沒有轉入其他工廠的自由，可是現在則完全相反，任何時候都可以解僱，像申新九廠這種情形，並不限於上海，全國各地都是一樣的。

一九三四年，因為恐慌的深刻化，其直接的結果，是失業人數，有驚

人的增加。就上述那位學者陳氏的計算，全國失業者數，已達一千二百萬。然而這個推算，較之實際的數目，還遠較爲小。報紙上時常載有這種推定的數字。如陝西淮縣鹽業的失業工人，有二十萬，江西景德鎮瓷器失業工人，有十六萬，郵差的失業者達十萬等。據上年五月五日上海社會局長的演說，失業者的人數，較之一九三三年，增加了一倍。據中國工商救濟委員會的報告，本月三十日業已登記的失業人數，僅僅上海已達七十萬人。根據上列數例，我們不難推知全中國的失業的人數，將是如何的龐大！

B 饑餓與農民大眾的不滿

一九三四年因爲大水之外再加上六十年來未有旱災，農業恐慌是更加激化了，結果是到處發生反抗地主土豪的事情。據中央農事實驗所的調查，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甘肅，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十省、因爲旱災的影響，其景况已是目不忍觀；而十四省二百八十三縣，則因大水爲患更是無比的荒涼（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西，陝西，安徽，江蘇，福建，山東，貴州，察哈爾，綏遠）（賑務委員會的報告）。

災民之數，竟超過一億五千萬人。這種可驚數量的犧牲，是中國積年失政的結果。蓋自一九二七年以來，水災，旱災以及其他悲慘的事件，接踵而至，這些災難，是不能把牠只看作天災，而與人事無關的，使天災達到這樣嚴重的程度，則失政之責，是應有所歸的。一九三四年農業恐慌因天災

與人禍的相因相成，故更加深刻化，農業生產愈加減少，農產物價還在下落，農民的貧窮更加增大，而農民的不滿也愈加激化。

(1) 農產物收穫的繼續減少。據中央農事實驗所的計算，九種主要農產物，較之一九三三年，減少了一七%。

一九三四年農產物的收穫(單位千擔)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小麥	四七二,〇六四	四三九,一七五
米	一,〇五五,三九七	七六六,六六八
高粱	一六九,六五一	一三七,二六三
小米	二八,二三三	一四六,二六六
玉蜀黍	二六,八九	二六,二九六



豆	一九,五九	二二,九三三
馬鈴薯	三三,七三四	三三,九七四
棉花	三,二九三	一四,八九五
花生	二,九六〇	六,二七九
共計	二,五二五,八七	二,一〇六,九九一

全體看來，農產物的收穫，是更加減低，根據上述實驗所的計算，十八種農產品的產額，一九三二年是十八億八千萬元，一九三三年是十五億元，而一九三四年則降至十億元以下。換言之，一九三四年的農業生產，較之一九三二年減低了一半，較之一九三三年，減低了三分之一。

(2) 農產物價的續落，雖然農作物的收穫銳減，但農產物的價格，並



不因之騰貴，反之還低落了。據金陵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調查，華北批發價格的指數，有如下表（以一九二六年為一百）。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原料	九七·九	七四·七〇
農產物	八九·七四	六四·二六
畜產物	九六·七三	七六·五二
礦產物	一〇一·五〇	八六·一〇
製造品	一二四·二七	一〇五·五五
生產工具	一二四·五九	一〇〇·三三
消費資料	一二三·〇九	一〇七·六六

農業副產物的價格低落，尤其利害，上海雞蛋批發價格的指數，從一

九三二年之九一·六竟跌落到一九三四年之五六·二。高郵蔬菜的價格，普通總在二千文一擔，一九三四年的冬天，竟跌落到一千文一擔，這可以說是打破記錄的低落。然而米價因為有每擔三元的輸入稅，約騰貴了四成到六成，這使貧困大眾的苦痛，格外加深了。

農產物的價格，與農民購入日用品的價格之比，一九三一年是九六比一百，一九三四年則低落到七〇比一百，這使農民的貧窮化格外加速。

(3) 農民貧困之增大。佃農在農民總數中所佔的百分比，一九一九年是三二%（日本同文會的調查），一九二九年則為三二·八%（南京立法院的調查）一九三四年更續增為三六%（南京實業部的調查）。其次，農民的負債，也大大增加，全農民中為高利貸所迫者，達百分之六十二。貧農之

離開故鄉，每年都在繼續增加，浙江，江蘇及安徽等省農村人口的三·八五%，都在流浪，逃荒中過活。山東及河北的逃亡率，竟達到四九%（東方雜誌一九三四年一月號八七頁）。而山東有幾個縣分，農民之向他鄉求食者，要達到六〇%（南開大學經濟季刊六卷）。

農民的生活水平，已急劇的低落，他們已無力吃米，只好以甘薯，大麥·粟，稗子等爲食，一九三四年米的輸入，較上年減少了一百二十五萬九千擔，就因爲這個原因所致。災區的農民，不論樹皮草根都取作食物，就是泥土也拿去充飢，新聞上往往有全家投水，毒死或吊死的消息登載出來。

- (4) 農民不滿之增大。農民雖然是這樣的貧困，可是各地賦稅還在提

高，地主也在增加地租，把農民最後的一滴血也吸盡了。一九三四年各地對於飢餓的農民，不但沒有支出一文救濟的資金，反之還連月實施賦稅的增高，且用強制手段來徵收。江蘇省有八百農民，因未繳地租而被檢舉。在縣政府之下，設有『地租局』，僅僅一個月之間，地主申請強制徵收地租者，達四千件，每天平均有二十個農民被投到獄中。對於檢舉的農民，禁止與家屬會面，且常加以拷問，所給予的食物更是不堪入口，用這樣方法來強制他們即時繳出地租。

這種強制辦法，惹起農民的抗稅抗租，乃是自然的事。根據新聞的報告，一九三四年七月以來到一九三五年一月，農民騷動的事件，共有一百一十次，最烈的地方，甚至發生武裝衝突。上年七月浙江省章安鎮，農民

因飢餓而起騷動，奪了數百包米糧。同年八月飢餓的農民在浦江鬧了幾個月。八月江蘇溧陽也有農民騷亂，很久才鎮壓下去，同年之末，數千飢民，在武昌掠奪米穀。

到了九月形勢更壞，溧陽又有騷動，廣東的南部也起了米的騷動，結果幾百人被拘。十月河北大名的農民，與警察發生衝突，死傷達四十名，就是和平的蘇州附近，也發生反對強制徵收的運動前後四次騷亂，人數共達一萬。鑑於這種情勢，結果當局不得不給農民一點買米的資金與停止強制徵收的諾言。

此外，十一月，江北有數千農民反對強制勞動，十二月蘇州又有農民的騷亂，一九三五年一月揚州有數千農民反對加租，十分頑強，二月安徽

巢縣與合肥之間石塘橋地方，有一萬農民發生米的騷動，不久就波及隣近各地，一直繼續到三月。

○ 都市中破產者之繼續出現

目前中國的商業資本，在都市中受到帝國主義的特別保護，在農村中則利用封建殘餘的勢力。商業資本不管在都市抑或在鄉村，其本身就是高利貸，每年平均的利息最少是二成，因為在豐年牠會把凶年的損失補償而且有餘，所以商業資本，外觀上好像不知恐慌為何物似的。然而商業資本究竟也與工業資本同樣，不能抵抗恐慌的狂濤，一九三四年，城市的商家繼續破產，比較大的商號，都相繼倒閉，這種破產的狂濤，已經波及到全



國了。

首先說華北，山西太原一九三四年有四千家商店關了門，北京則有三百家倒閉。其中有開設百年以上的老舖。天津關閉的商家，連月達三百餘，上年的破產者，竟達四千斤。若根據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申報的天津通信，則上年一年中，關門的商店有一萬一千家之多。

華南也一樣的險惡，廣州從一九三三年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六月，關閉的商店，有五千二百九十一件。一九三四年一年中，破產者約三千六百家，佔全商家之二成。香港到一九三四年末為止，商店倒閉之事，有一千二百件。

現在來看一看長江流域，四川省會成都，三個月之間，有一千家商店



倒閉。關於華中最大的都市漢口，雖沒有什麼統計，但根據新聞的報告，最近建立的大路兩旁的新商店門面，沒有一家開張的。就是在首都南京，一九三四年中，也有一千家商店倒閉，這已使當局者有些愁眉。

上海在一九三四年中，有六百家商店倒閉。一九三五年三月，商店有四成，工場有三成都關了門，把七十萬人的失業者拋到街頭。一月二十七日上海時事新報上說：『上海最要緊的大路——南京路，商店與公司的半數，都在債務之下呻吟……法院與市當局，在採取足使商店半數以上倒閉的急劇手段以前，不得不相當躊躇的。』一月十六日上海市民大會曾通過一個決議，要求債務的償付延期一年，房租的支付延期六個月。

近來上海空屋的激增，就足以說明恐慌的深刻化，根據一九三五年二

月一日市當局的報告，上海的空屋增加，有如下表：

房屋數	一九三二年冬	一九三三年	
	九,六三三	九,九九三	九九,九九六
空屋數	四,六三三	五,七六四	七,〇五一
空屋之增加率(%)	一〇〇	二一〇	一四七.四

一九三三年新築的房屋，達五千一百三十幢，一九三四年較之上年，減少了五百五十九幢（上海中國晚報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

上海的交易總額，從一九三四年一月到同年十一月，是一千一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五十萬元，較之上年同期，減少了四分之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的申報說：『交易這樣的萎縮，是上海開市以來，少見的現



象。』

現在來看一看都市的住民呢。天津與上海，全人口三分之一都是貧民。下表是說明中國政府治下，各主要都市的窮困，到了什麼程度。

一九三四年冬主要都市的貧民數(單位千人)

	住民總數	貧民數	貧民在全人口中之比例
上海	三,四二六	一,〇〇〇	三三%
天津	一,三九一	四五〇	三三%
漢口	七四三	五〇〇	六五%
廣州	九五四	一〇(乞丐)	
北平	一,五四九	一,二〇〇	八〇%
南京	七四六	五〇(乞丐)	



中國的經濟情勢

杭州 四六七 100(半乞丐)

揚州 300 四 3%

南昌 二六六 11(乞丐)

根據這個統計，北平人口，幾乎是全部，漢口人口的三分之二都是貧民。

與都市人口的貧窮同行者，是商業資本利益的減少，故他們相互之間的競爭，於是激化起來。他們當中有的便倒在外國資本的懷裏，購辦私貨，用賤價向人們拋賣（如天津一帶），以圖賺錢。

中國商人，十分爲美國的購銀政策所苦惱，因爲得不到資金的通融，故相繼倒閉着。而各種捐稅，還在花樣翻新，雖然廢除苛雜的呼聲，叫得



很響，但捐稅到處都在提高，再加上恐慌與天災，自然使疲弊的商民，更受深刻的打擊了。

D 中國經濟之向日本屈從

一九三四年中國對於日本要求的承諾，使中國經濟的隸屬傾向，更加漸次顯著。特別是華北，隸屬程度更甚。這可以由下列事實來觀察。

(1) 關稅的改正。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對於日本主要輸入品的關稅，減低到八%至四〇%。同時對於英國商品的輸入稅，也減低了，但英國商品則顯然支付較高的關稅。其結果，使日本的對華貿易，又將回到第一位（一九三一年以前，日本常居着第一位），因之使中國棉業及其他輕工



業，將授到更甚的壓迫。

(2) 稅關的增設。由於一九三四年七月日本的要求，在長城各口設立了二十多個稅關，這使日本商品侵入華北更加容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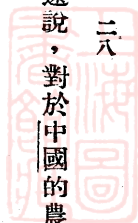
(3) 北寧鐵路的停止通車，本是抵制日本的手段之一，但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所謂通車問題已得到解決，北平奉天之間於是有了直通火車。這在經濟上，戰略上對於日本都有很大的利益。

(4) 通郵問題的解決。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滿』的通郵問題解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信件開始往還。裏面包含有匯兌的恢復，牠與通車相輔，使日本的經濟發展，更加便利，這是不用說的了。根據十二月十九日南京中央社的報告，一九三四年日本商品經過天津輸入的，較之一

九三一年增加了四倍，日本商品所納的關稅，在天津海關的輸入稅中，佔百分之八十。從這裏可以推測，華北市場上的七〇%到八〇%，都握在日本人的手中。此外日本商品的走私，已在非常盛行，這是人所周知的，若把這個也計算進去，那牠的比例將更要增大了。據有人計算一九三四年華北的走私品，已達三千萬元。至於華南以及華中，日本的勢力也正在伸張。在汕頭，有四十家中國商店，專門從事日本私貨的輸入。這些走私商人，與廣東富裕地方東江的小商店都有聯絡。這種私貨的總額，約當經過稅關的商品三分之一。在長江流域，日本商品正在驅逐英國商品。南滿鐵路聽說已拿出五百萬元，想在長江沿岸設立許多調查所。一九三五年春，日本與中國談判，要中國爲日本的工業，生產原料品（棉花，羊毛等），

用物物交換制，日本便把工業製造品輸入中國。日本還說，對於中國的農業，將予以技術的援助。

爲對抗日本這樣的猛進，列強的對華政策，於是相繼積極起來。英國除在外交上與日本折衝，在政治上經濟上盡力保持他的地位以外，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派遣二千兵隊，佔領了雲南西部的班洪，一九三五年三月，又擴大佔領區域包括到猛宋，把當地的金鑛，完全掌握到自己的手中。法國也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佔領了雲南的一部。一九三四年之夏，英國在『建設四川鐵道及開發鑛山』的名義之下，允許給劉湘五百萬元的借款，其實只是擴充牠的勢力而已。英國又在湖南獲得了錫鑛的獨佔權，日本認爲這是破壞了『門戶開放』的原則，因此提起了強硬的抗議。



除此以外，英國之努力促成粵漢鐵路的完工，英國之積極開闢航空路線，都是人所周知的事情。

E 列強資本的輸出戰

有一個統計表還沒有製造出來。若根據那個表格，就可以說明一九三四年列強對華資本的輸出，及其爭奪中國市場的白熱化。上年帝國主義各國，向中國輸出資本，顯然有增加的傾向，這裏也可以證明在獨佔資本主義時代，資本的輸出，與世界之經濟的與政治的分割，是有密切關係的。列強對華的資本輸出，其根本動機，決不是如某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所說的是爲了中國的工業化，而是藉中國買辦的助力，把中國放在帝國主義



的支配之下而已。

首先，我們來說列強在中國貿易上的相互鬥爭：美國是代替日本而起的中國貿易中最大的輸出國，牠依然保持首位，日本屈居第二，英國則被排至第三位。這三個在中國輸入貿易中互爭雄長的國家英，日，美，在一九三四年的激烈貿易戰中，都拚命的企圖增加各自的成數。這在下表中可以看得出來，但是一九三四年中國貿易，無論輸出輸入，都減少了二成以上，這是必須注意的。事實上美國與日本的比例都增加了。反之英國的對華輸出，主要的因日本競爭的影響，是顯然減少了。

中國輸入貿易中，各國所佔的比例(%)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美國	三三·一元	二五·四二	三三·八六	二六·六	
日本	二二·六	一四·五	九·九	三三·三	
英國	八·二元	一一·〇	一一·三	一一·〇〇	
德國	八·七	六·七五	七·九五	八·九	

除英國以外，美國與日本的比例都增加了。若把一九三三四年貿易數字加以分析，可知消費資料的數量減少，而重工業製品的輸入則增加了。據許多評論家的意見，說這是因為都市與農村都瀕於破產，帝國主義的商品，縱用傾銷的價格拋售，然中國人民已無力吸收所致。米，麥，棉花等，常居全輸入貿易中之首位的，一九三三三年的輸入是顯著減少了。反之



機械，金屬，車輛等則有大量增加，在一九三四年全輸入貿易中，增高至一八%。

重工業製品的輸入(單位千元)

金屬與鑽石	機械及器具	車輛及船舶	以上三種在輸入總額中所佔比例
-------	-------	-------	----------------

一九三三年	九七,〇六六	四三,二七六	三三,三三三	一三%
一九三四年	九六,〇三三	五九,三三三	三七,〇一六	一八%

車輛及船舶輸入之增加，是爲了列強商品輸入之便利，及對內軍事交通之建設。這種事實的證據，可以從西北的公路網及鐵道網的建設計劃中，看得出來。這個計劃在全國經濟委員會首席顧問拉西曼博士，對國聯的報告書中也曾述及。輸入的機械及器具中，有一部分，無疑的要用作建



設外人經營的工場，這是日英美資本家榨取中國人民，及壓迫中國的民族工業（例如中國人經營之下的紡織公司）之最好的利器。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企業投資，及帝國主義對中國企業與對政府之用借款方式的資本輸出。關於這個問題，沒有正確的統計。據上海社會經濟調查所的估計，到一九三四年爲止，帝國主義各國對華資本輸出的總額，約爲三十二億美金（引用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上海日本漢文報紙江南正報）。但另一日本雜誌東亞，則估計英日美在中國的投資（除去借款），到一九三四年爲止，是四十三億四千萬美金。我們可以確切的說，所有的投資加上純粹的借款，帝國主義資本在中國的總計，一定要超過四十億美金。

東亞雜誌，還把列強資本，在中國急速增大的事實，發表出來。一九一四年列強投資的總額，約十六億一千萬美金，但到了一九三一年竟增加了三倍。這就說明帝國主義的投資，在中國是怎樣日漸佔有勢力。投資與借款合計起來，日本在一九一四年，佔總額的一三·六%，到了一九三一年則急劇的增高到三五·七%；英國在一九一四年佔三七·七%，一九三一年則稍減為三六·七%。美國在這一方面則遠較落後，大約只佔六%而已。底下是東亞雜誌關於英日美投資（包含借款）所列舉的數字（單位百萬美金）。

日本

一五五〇

英國

一七六〇

美國

三四〇

總計

三〇四〇

這個總數當中，日本佔五三%，英國佔二四%，美國佔七%。僅僅在三年之間，日本從三五·一%（一九三一年），飛躍到五三%（一九三四年），牠凌駕英國的投資，至百分之百以上。英國的比例較之一九三一年減少了一二%。這主要的是由於日本劇烈進攻的結果。事實上，英國不僅在投資上，就是在貿易上，也被日本奪去了牠的地位。美國雖然在中國貿易中佔着首位，但在對華投資中，只佔着貧弱的比例，這個原因，是因為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沒有特定的勢力範圍，只好嚙食他國的勢力範圍，又因為鐵道，鑛山等地盤難以獲得之故。美國的投資，主要力量，是貫注在商行，銀行以及佈教事業上。因此美國也顯然與其他列強同樣，其投資只有妨害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這就是說牠們的投資，浸透了中國產

業的一切部門，與中國產業抗爭，結果把後者打得粉碎。過去數年間，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領土，也有很大的貪念，牠的投資都貫注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即廣東，湖南，四川等的鐵道建築上，這都是由經濟的及戰略的見地出發的。

至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借款，大多帶有政治的性質，數年來這種借款之爲人所注目的，是一九三三年美國五千萬金元的棉麥借款，一九三四年意大利的四千萬元借款。據報紙所載這些借款，都是爲了經濟建設之用，但美國上院軍需品調查委員會主席雷氏，則發現借款爲購買飛機與彈藥之用，另據半官方面消息，則承認意國借款之大部分，是用作綏靖內亂。英國爲完成粵漢鐵路，也不惜從庚子賠款中撥借巨款，以圖達到牠的

慾望，即把中國西南各省，與牠的東方堡壘香港聯接起來，藉以保持牠的穩固地位。以上各種借款之帶有苛刻的政治經濟條件，那是不用說的，在牠們每一次進展之中，中國的殖民地化，也就更加加深了一層。上述美國的棉麥借款，曾惹起帝國主義各國之間非常的嫉妬，日本對於他的反感，是特別急劇，因之有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聲明。在日本看來，中國只許日本『提攜』，『親善』，『合作』，那時日本便可以給中國大量借款。所以新聞上所傳的英美借款，一說兩千萬鎊，一說二億美金，其交涉先在倫敦，後在華盛頓，結局都因日本強硬的反對，沒有任何成果。日本的心意，是不許其他各國參加，自己單獨對中國借款。這樣一來，使英國所提唱的日英美法的共同借款（一九三五年三月有表面化之勢），不得

不攔淺大吉。英國的意思，是要藉這種手段，打破日本對中國的獨佔，使中國回復到均等支配的舊觀，可是直到現在，英國的這種企圖，因為美國的冷淡，日本的反對，終於沒有實現。

現在來引用瓦爾加的話，以作本節的結論，他說：『帝國主義全部政策之根本思想，斷乎不在使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工業化，而是要確保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原料資源，阻止這些殖民地生產力之發展，使其密切的隸屬於本國。』

F 白銀恐慌的尖銳化

因為美國購銀政策之異常熱心的實行，中國的白銀恐慌也就更加激

化。牠促進經濟恐慌的深刻化，使中國更加衰頹。不用說，美國的白銀政策，最初是在於解決美國白銀生產過剩問題，在這個限度以內，是可以達到美國產銀資本家的宿望的。但是美國資產階級，不情願把白銀政策的收穫，單讓產銀資本家塞進腰包，牠要使白銀政策，對於全部資產階級都有利益。從這個見地看來，美國的白銀政策，帶有如下的意義。（一）美國以這個政策，對於行將到來的國際危機，作牠的具體準備的步驟。（二）由於白銀政策的實行，美國帝國主義，使自己在將來的階級鬥爭中，增大對勞動階級的抗抵力。（三）這個白銀政策，是美國帝國主義對其他帝國主義（如英帝國主義），在外國市場上之鬭爭的武器。（四）美國帝國主義在太平洋制霸戰中，或者更具體的說，爲了支配中國，要利用這個政策。

美國爲了準備第二次大戰，不僅聚集了巨額的黃金，而且也要聚集巨額的白銀，其理由，是白銀在戰時要演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銀價曾極度騰昂。所以美國現在就要努力蓄藏巨量白銀，以免戰爭一起，要出高的代價去搜求，或者縱出高價也搜求不到牠。其次，美國資產階級，要預先防止戰爭中通貨膨脹的不幸結果，所以在現金準備之中，也收集白銀，使其保持一（銀）對三（金）的比例。這就是說要從膨脹的犧牲者勞動階級手中，奪去反攻有產者的有效武器。第三，美國可以用統制的白銀政策，在海外市場的爭奪戰中（如南美及英國自治領地），很容易的把英國打倒。

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爭霸的鬥爭中，本想大大努力一番，一九三一年

以來，美國把中國貿易中佔第一位的日本壓倒，自己躍居第一位。一九三二年的棉麥借款，照預測美國在中國的支配力，定然要加強，但是由於日本強硬執拗的反對，終歸失敗。現在美國的對華貿易，雖然仍居於第一位，但牠究竟不能把中國放在自己手掌中，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的關稅修正，主要的是對日本有利，而對於華盛頓則爲不利。這個新稅率施行以後，通觀一年間美國對華貿易，的確有減退之勢。

在太平洋上佔着最重要戰略地位的中國，是日美二大強國鬭爭的目標。誰能在現在支配中國，則在將來的大戰中，擊破牠的敵手是更加便利。爲對付日本的地理接近及其軍事的優越性，美國便想利用牠的經濟的優越性，以圖鞏固其地位。爲美國銀政策打得遍體受傷的中國工商業者，

因爲經濟的毫無出路，最後反確信非懇求美國不可，事實上他們已多次向華盛頓哭訴，要求白銀政策的和緩施行。

直到現在，美國的白銀政策，除掉惹起上海及其他主要城市的銀的飢荒以外，差不多沒有得到任何效果。這就是說美國在中國政府中，沒有恢復到牠的決定的地位。可是美國帝國主義，還在頑固的執行牠的銀政策，對於中國的要求，答覆說『沒有變更銀政策的意念』。自然，美國在沒有把中國完全取在自己的手中以前，是不會放鬆牠的銀政策的。由上述幾種理由看來，美國是否能把銀政策極端的完成，是很值得疑問的。

我們在禮讚美國的白銀政策以前，必須來考察牠的幾個缺點。第一，假使要把銀政策，頑強的執行到極度，那恐怕非犧牲牠在中國貿易中的第

一位不可。因為由美國銀政策所助長的中國白銀飢荒，將與經濟危機並行，牠發展下去，必然要使全中國經濟破產，因之也就要使帝國主義各國的一切貿易覆亡。在紐約的國民城市銀行一九三四年的月報上，曾指出美國通商的這種危險。第二，若美國執行銀政策到底，則中國的恐慌，必定更加尖銳化，其自然的結果是經濟的完全破產，那時中國的工商業者，必然衰弱，而中國民衆的騷亂會因之而起。這就是爲什麼美國雖然重覆申明要施行既定的方針，但另一方面並沒有把銀政策執行到極度的原因。

美國的白銀政策，上面已經說過，在中國惹起了極度的白銀恐慌，現在這種恐慌還在繼續。據海關的統計，一九三四年中國有二億五千九百萬元的白銀流出外國。若把廣汎的偷運，加上去計算，那一九三四年白銀

流出的總額，約有五億元，這就是說已接近流通銀總額的五分之一。因此到了十二月，銀的恐慌，在各主要城市裏都勃發起來，銀子完全消跡了，現銀支付停止了，銀行相繼破產了，上海十二月二十日，利息竟暴漲一成八分。一般經濟學者及評論家，於是都反對銀本位，而贊成銀元的減價，贊成以銀塊爲基礎，制定紙幣本位。國民政府於是創設了通貨委員會，以研究幣制的改革及救濟銀恐慌的最善辦法。

結果，爲制止銀的危機，政府曾實行增加銀的輸出稅至百分之十，並實施平衡稅，斷行匯兌的管理，並且從外國市場上，購入白銀。但是這些方法，『到底沒有達到所期的目的』（參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二卷二五三頁）。

銀恐慌雖然有這些對策，但依然還在惡化。金融市場，依然極度梗塞，許多商店還在繼續倒閉，商業是普遍的衰落，工業特別因流動資本的不足，更陷於危險的狀態，（參看中國工業救濟委員會的宣言）而全國五億紙幣的信用也在動搖。

G 中國的經濟恐慌與銀行的農村放款

一九三四年農業恐慌的尖銳化，給予帝國主義者及上海金融業者以重大的警告，即是說他們在農村的支配將發生破裂。上海的金融業者在帝國主義的指示之下，為救濟那動搖的支配權，於是把巨額的資金投向農村。據可靠的統計，一九三四年上海各銀行向農村的投資是六千萬元，其

五分之一是所謂直接投資，其餘的是間接投資。這裏面並不包含爲期票貼現及再貼現，向農村所投的資金，近年來銀行在農村中實行貼現，年年都有增加。上海金融界的首領張公權，李銘，陳光甫等及馬寅初那樣有名的『實用』經濟學者，都大聲急呼，要投資救濟農村，其結果，一九三四年上海各銀行向農村的投資，忽然增加起來。

早在一九三〇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就曾調查對農民放款的可能性，牠投資的結果，得到很大的利潤。其他各銀行看見這種成功，也都來倣效這個先例，實行投資。一九三三年上海銀行，設立了農業合作貸款部，共貸出一百萬元。同時中國銀行，也設立了八十多個倉庫，對於農產物會貸出一千九百五十萬元。一九三四年各銀行除各自實行放款以外，並且

爲了放款給陝西的棉花生產業者，上海六大銀行（中國，交通，上海，金城，浙江興業，中國農民）且組織了一個新提加（棉業產銷合作投資團）。

上海的銀行，對於棉花烟草的生產及輸送，都給以資金的通融，而對於信用協作也給以巨額的放款。這樣一來，上海銀行家對棉花放款的結果，第一是獨佔棉花的生產，以援助帝國主義。第二是使在牠支配之下的紡織工場有確定的原料供給。西北地方的棉花生產，每年要超過五千萬元以上，因此上海的銀行家，由棉花的投資，使日本工場主，在華北與山東，事實上獲得棉花的獨佔。中國所有的紡織工場，則因無力歸還債務，必然要轉到銀行的手中，上海銀行家之希望自己工場中所必需的棉花，最好在自己支配之下，乃是當然的事。

關於擔保放款，上海的銀行，一九三四年也得到可觀的成績。這種放款，逐年都有增加，一九三四年銀行更添設許多倉庫，徵收的利息多至一分六厘。因此有一部分新聞記者說，這是一種『新式的當店』。這樣一來，銀行已代替了那些因農業恐慌的尖銳化而沒落的舊式高利貸者。後來，銀行家自身，也不得不承認，銀行的放款，對於將農產物賤價賣給商人的農民，並沒有什麼好處，反之商人却得到銀行放款的很大的利益（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時事新報）。此外，農民要想得到銀行的放款，必須先有二十元至五十元的擔保，否則便得不着放款。反之商人與高利貸者，則很容易得到放款，他們把借來的資金，再分借給農民用高利貸方式，對農民加以榨取。因此銀行的放款，只給了商業資本，高利貸富農，地主

等以很大的利益。

最後，銀行的放款，經過人們認為復興農村最重要的組織——合作社，以流入農村。農民因為沒有飯吃。合作的名詞，對於他們的確是很香甜的。由華洋義賑會所設立的許多合作社，現在正逐漸發展。其活動的大部分，都集中在信用與放款上。這些合作社，是帝國主義及銀行資本，要維持牠農村中的勢力之工具。合作社的大部分，都握在富農及鄉村統治者的手中。據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央農事實驗所的調查，合作社的放款，不過只佔農民全負債額的一·三%，而合作社對農民的放款之中，五六%都是五十元至二百元的大量放款（在中國農村上說來）。因之合作社的社員，非支持鄉村的主人不可。

總之，上海各銀行的所謂農村投資，主要的是克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在農村中的危機，要保持帝國主義及其自身的低廉原料，牠只救濟了鄉村的高利貸者，地主，富農，而對中小農則只有榨取束縛的作用。上海的銀行業者，因為在公債的買賣，不動產的交易，民族工商業的投資上，得不到很大的利益，於是轉個方向，來開闢新的廣大的榨取領域。在這種情形之下，其鞏固帝國主義的支配，維持殘酷的剝削關係，絲毫不能改革農民的經濟，乃是毫無疑問的事。

中國與白銀問題

阿爾庫斯

白銀之在美國，原先本已被人看作『忘記的金屬』，但自從羅斯福在通貨政策上重視白銀以來，則完全改觀，自此政策實施以來，中國的經濟，又受到劇烈的打擊了。半殖民地的中國，向來就是銀的忠實伴侶，現在在銀的世界市場上，已失去牠的作用。今日持有這種影響力的，是世界銀的生產者，倫敦及紐約，中國在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聯繫的各方面都沒有有一點防備，同樣，在銀問題上也是如此。縱然資本主義各國的銀政策，很顯然有害於中國的經濟利益，但中國對於這種政策，也未能發生什麼積極的作用。中國處在經濟崩壞，幣制混亂，現代信用制度的缺陷之下，對於銀

的問題，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對抗的策術。

現在我們且把羅斯福的銀政策在中國所惹起的各種現象，加以詳細的觀察。自從一九二九年末，紐約交易所的恐慌驚雷一般的爆發以來，銀價不斷的低落，是人所周知的事，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牠相當的騰貴起來。一九三二年，白銀的平均市價，是一溫斯二十三·八仙，達到一九二九年來之最低額。從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銀的市價開始騰貴，一月是一溫斯二十五·二仙，六月是一溫斯三十七·八仙，十二月是一溫斯四十三·五仙，一九三三年平均銀市價，是一溫斯三十四·七仙。一九三四年，白色金屬的騰貴，更繼續進行。一九三四年六月的銀市價是一溫斯四十六·五仙，八月一溫斯五十仙，九月達一溫斯五十·二五仙。從八月十三日起，

即從羅斯福宣佈美國白銀爲國有起，僅僅四日之間，紐約的銀價，從一溫斯五十仙起，增加到一溫斯五十五·八仙，即騰貴了一一·二%。

使銀價騰貴的最初刺激，是一九三三年七月的倫敦協定，美國會熱心參加，其中有參院白銀委員會主席畢德門。而具有特殊重大意義的，是由下列兩方面所締結的特殊協定：一方面有中國，印度，西班牙參加，另一方面有產銀國加拿大，墨西哥，比魯，美國參加，議定了禁止販賣藏銀及限制產銀國販賣白銀。可是銀價騰貴的決定因素，還是美國的政策。更具體的說，就是下面兩個條令，一個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羅斯福大總統令，規定美國一切新產白銀，用一溫斯六十四·四美仙的價格（若就美金市價的低落，換算起來，實質上的價格是四〇·四美仙），由政府收買；

一個是八月九日羅斯福的佈告（根據五月議會所通過的購銀法案），規定美國的白銀，用一溫斯五十·〇一仙的價格，由國庫收買。美國這種政策，是使銀價運動轉向騰貴的槓桿，乃是毫無疑義的事。關於羅斯福購銀政策的動機，及支持這個政策的官方論說，這裏不想加以檢討。無疑的，在這裏演着重大作用的，乃是國內政策上的因素，特別是要努力保持十一月下院改選時那所謂『銀派』的支持。此外我們可以想到，另一擁護白銀應有高價的理論，是說高的價格，可以提高『銀本位國家的購買力』。這些銀本位國中之最大的，正是中國。

銀價的騰貴，即刻就使中國匯兌行情，即銀圓，騰貴起來。中國銀元一九三二年的平均市價，等於美金二十一·七仙，一九三三年則等於二十

八·五仙。一九三四年中國的銀元市價更加騰貴，在三十三至三十四仙之間上落。

當一九二九年銀價激落，因之中國銀元市價也隨之激落之時，人們都認爲這對於中國最壞，且無疑的要使中國破滅。當時沒有任何人能預見到，銀元價格的低落，在經濟恐慌的各種條件之下，對於中國將要有些利益。然而現在看來，銀價的低落，雖然在輸入及償付外債上，要吃很大的虧，但對於中國的經濟，在某種程度上，確是有利的因素，這已是很顯然的事。由國際聯盟派到南京去的顧問蘇爾德氏，認爲銀價變動以後，才造成了中國的恐慌。他說：一九三一年至三二年冬天以前『中國因爲不像其他各國採用金本位制，而是採用銀本位制，所以在國內經濟活動上，完全

免去了匯兌跌落的影響』(Arthur Solter, *China and Silver* P. 5.)。一九三一年九月英國脫離金本位制，十二月日本放棄金本位制，當時中國的匯兌，對英日兩國的關係，都騰貴起來，這已使中國立於不利的地位，等到美國也脫離了金本位制以後，則更使中國的地位惡化了。總之，誠如蘇爾德所說，中國自一九三一到三二年的冬天，才開始『走到極深刻的不景氣時代。差不多一切的指標，即物價，輸出入的金額及其數量，銀行統計等，都是以一九三二年冬爲轉變點的。』

但是，銀價的變動，雖然是中國恐慌的決定的因素，然若因此作出結論，說一九三二年冬天以前，中國是叨蒙白銀減價之恩在一般危機的大海之中造成『幸運之島』的唯一國家，那完全是錯誤的。中國恐慌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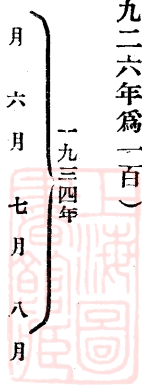
不應在白銀問題上去搜求，很顯明的應該從中國現狀的基本原因去尋求，即應從生產力的狀況，特別是農業的狀況，農民大眾購買力的破滅（這一部分是由於銀價跌落的結果，根本上，則是貧窮化的結果），中國輸出的減退，以及中國乃是帝國主義榨取對象的半殖民地等原因去追求。假定其他的條件不變（即世界的物價，一般的都不低落，帝國主義各國對於中國，都不加以經濟以外的壓力），那麼，銀價低落，在理論上是可以予國內生產以刺激的，因為對於比較昂貴的輸入品，可以競爭，但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現在我們且來檢討銀價先是低落，而後又漸漸騰貴的各種具體事實與結果。我們知道，中國與金本位制的資本主義各國不同，當銀價低廉之時，中國各大商埠的批發價格，還保持着高的水準。

主要商埠的批發物價指數（以一九二六年爲一百）

港名	一九三四年			
	一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上海	104.50	111.40	103.80	97.10
天津	112.08	113.36	101.04	92.01
			89.19	96.66
				94.66

從上表可以看到上海及天津的批發物價，一九三二年會保持着相當高的水準（一二六·七〇），但一九三二年就開始低落，一九三三年隨着銀價的騰貴，是更加低落了。

一九三二年的低落，是與英國及日本脫離金本位有關的中國銀元對金鎊及日圓匯價的反映。



一九三四年銀的市價繼續升高，與之相應的批發物價的低落，則更急劇的加速。因此，看起來對於中國國內的物價，銀價的低落，無疑的可以說是一種有利的因素。

現在來看銀價的變動，在中國貿易方面，惹起了怎樣的變化。

上海市場輸出入品的物價指數（以一九二六年爲一百）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一月
輸出品	105.2	90.3	82.0	72.8
輸入品	107.7	140.2	133.3	127.1

（“Prices and Price Indexes in Shanghai” 1934.）

銀價激落的一九三一年，上海市場上輸入品的物價指數，是非常的高



(一五〇·二)，這是必須注意的。一九三二年這個指數，受英國與日本脫離金本位的影響，低落了一些，因之銀元對金鎊與日圓的匯價，有若干騰貴，但指數總是保持着相當高的水準。由這樣看來，似乎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惹起外國商品騰貴的銀價低落，應成爲阻止外國商品流入中國市場的因素，同時因銀價的低落，自然使中國輸出品價格低落，因之應造成輸出繁榮的傾向。然而這兩種現象，都未曾發生。

這裏輸出品價格，曾表現『倒逆的現象』。從理論上說來，一九三一年牠應該低落的，然而這一年較之一九二九年上海市場上輸出品物價指數，反爲騰貴(一〇七·五)，在銀價騰貴的一九三三年(輸出品物價，應該因之騰貴)，輸出品物價指數，反繼續低落，到了一九三四年底落還沒

有停止。這種一見難解的現象，是因為中國輸出品物價的水準，要為世界各國對中國商品需要所決定，在這種基本的原因中，所以才有這種倒逆的現象發生。對於輸出品物價指數，世界各國之對中國商品的需要，較之銀價變動，是更重要的因素。銀賤的時代也好，銀貴的時代也好，中國輸出品物價，都是低落的，這因為中國的輸出品，在充塞着龐大停滯商品的世界市場上，沒有充分的銷路之故，就是這種道理，使中國輸出品物價狀況發生反的作用。至於外國商品之向中國輸入，雖然當其騰貴的時候，中國也企圖減少購入，但結果不僅未減，反漸漸增加起來。因之入超達到巨大的數額。所以銀價的變動，對於中國對外貿易的狀態，其作用是很少的。這裏最要緊的因素，乃是世界市場對中國商品的需要，與外國商品在

中國市場上的傾銷。所以，這種現象，給那些主張銀價的騰貴，可以提高中國市場購買力的人，以一種有力的反駁。

中國年來之最可憂的現象，是從一九三三年開始，到一九三四年夏秋之交之劇烈的白銀外流。中國國內及國外，反對羅斯福銀政策的人，都說中國銀的流出是這個政策的結果，牠使中國已陷於白銀枯竭的危機中。事實上像這一年那樣，大量的白銀從中國流出，過去是沒有的，羅斯福的銀政策，無疑的要負一部分責任。可是使中國白銀流出，不減於羅斯福政策的另一原因，却在中國自體之中。這首先就要說到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態。

據中國銀行總理說，一九三三年度中國的國際收支，劃清以後，共付出二億八千六百六十萬元之巨額。這裏就要發生一個問題，中國究竟拿什

麼來填塞這個大漏洞呢？與此關聯的又有一個問題，即中國對於食物，原料，武器，彈藥，飛機等的輸入，用什麼東西去償付呢？換言之，中國的財政基礎，究竟建立在什麼上面呢？

中國的財政現狀，很明顯的就說明了對外國輸入的巨額軍需品的支付，是沒有經常財源的，一九三二——三三年度，中國發行了一億四千萬元的公債，而軍事費的支出，要佔預算的大部分。一九三一年軍事費佔預算的三五%，三二年佔四二%，三三年則增至五〇%。次於軍事費的巨大支出，是外債的償付。一九三四——三五年度的預算，教育費對軍事費與外債償付費的比率，是極其微小。全歲出是八億五千萬元，其中七五%為軍事費與外債償付費所佔，教育費不過佔三%而已（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

日申報)。財政的不足，多半由發行內債來填補。一九三三年末中國的內債，共爲十二億五千另七十七萬元。政府發行的內債，普通都分配給銀行銷售，銀行則把銀子交給政府。這樣一來銀子事實上，從國內吸收起來，流入外國帝國主義之手，以償付軍器，飛機，彈藥等的代價，這些銀子，是經過銀行用有價證券換來的。據中國銀行的報告，政府發行的公債，已形成中國各銀行資產的大部分，中國銀行資產的六五%，中央銀行資產的六五%，交通銀行資產的五三%都是國債。從銀行中吸收出來的銀子，都源源流入外國商行的金庫中去了。

若把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四年的中國貿易加以分析，則中國白銀流出因何而起的問題，便即刻明瞭。

中國的國外貿易（單位百萬元）

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輸入	八六·三	九五·〇	一〇一·〇	九九·四	八二·八	一〇五·五	一三四·六	一六五·五
輸出	四九·二	四九·三	四一·一	四〇·一	三八·〇	五〇·八	六二·二	七七·七
入超	三七·一	四五·七	五九·九	五九·三	四四·八	五四·七	一三二·四	八七·八



(Monthly Bulletin of Economic China) October, 1934.

中國在國外貿易上，付給外國的金錢，自從滿洲被日本佔領以來，是不斷的增加了。中國之失去了豐富的農業地帶，就是表示中國輸出品，失去了主要的品目——大豆及大豆的加工品。滿洲本是中國唯一出超地方，中國貿易每年入超的大部分，向來都靠滿洲來填補。所以自從滿洲失去以後，中國在國外貿易上出入決算的損失，極其巨大，這可以由最近數年間滿洲對外貿易的數字，來證明。

滿洲的對外貿易（單位百萬圓）（有△者爲入超）

輸出	輸入	出超
----	----	----

一九三六年

六五〇・三

四五一・七

一〇三・六

一九三三年	二六六·八	二〇二·七	△三五·九
一九三二年	二六一·五	一五四·八	一〇六·七
一九三一年	三三七·〇	一五〇·〇	一七六·〇
一九二九年	五二一·二	四四七·四	一三三·八

（中東路經濟通報第五號，一九三四年五月。這個表中，還沒有把許多日本輸出入商品計算進去，因為有許多商品並沒有算在公開的海關統計中。）

滿洲到了一九三三年，才開始破了多年的慣例，而有入超的現象。這種事實，很明顯的，是因為滿洲變成了日本傾銷的獨佔對象。日本自從佔領滿洲後，便利用所謂『特殊的情勢』，把賤價的商品，潮水般的輸了進



來。滿洲在三十年中，都是出超的地方，牠是中國國外貿易上，填補入超的重要因素，這是不可忽視的。但是今日的中國已失去這個有利的因素了。

上面已經說過，中國的輸出，就是在銀賤的時候，也不斷的減退。銀價達到最低額的一九三一年，中國的輸出，較之一九二九年，也沒有增加。這裏當然不能忘記，中國輸出中，已失去滿洲的商品，但是把滿洲除外也好，不除外也好，中國本部的輸出，其自身就已經大大減退，絲，茶等中國的重要商品，雖然因銀價低落而低廉，但在被各國商品所擠滿的世界市場上，終找不到銷路。那麼中國對於巨額的入超，將用什麼來抵償呢？中國銀行的總經理說：『若考慮到貿易上與貿易以外的輸出以填補入超之時，唯一的途徑，就是貴重金屬的輸出。在這許多條件之下，我國的

國民經濟，已經到了最危險的關頭。』（1935年四月十五日中國銀行報告）

中國銀行的報告，在另一個地方說：『現在，中國對於填補入超的辦法，都已經想盡了，華僑匯款回國又逐漸減少，在此情形之下，爲償付不足，很明顯的必須輸出金銀。這是上年最可注目的現象，也就是明示將來國民經濟，行將破產。』

由此看來，中國用什麼財源來填補每年的入超已經是很明日的了。中國白銀流出的過程，就是明示農村經濟破產與國內恐慌激化的過程。

一九三四年五月五日，*Central China Post* 論到中國銀行團的報告說：『中國農村的銀幣，先流到各省的城市，再由各省的城市，集中到通海的大商埠，這是爲了輸出才集中起來的。中國從外國取得的極其微小，

而向外國輸送的則是巨量的金銀。這種狀態的當然結果，只有破產二字而已。』

銀行團的報告，把白銀向城市集中，首先是向上海集中的現象，歸因於盜匪的橫行，一般的國內不靖，『富裕的人，不願把自己的金銀，再埋在土裏，農民怕盜匪的橫行和農產物價格的低落，不願從事農業。』

我們要知道，白銀從內地是怎樣急速向外流出，只要看上海各銀行存銀量之空前的增加，就可以明白了。

上海各銀行的存銀量（單位百萬銀元）

一九二九年

三三·三

一九三二年

二九九·七

一九三二年

三六〇・〇八

一九三三年

四三七・二三

一月

五七一・二七

二月

五七二・七

三月

五七一・三三

四月

六〇一・六四

五月

五九三・四八

六月

五六九・六二

一九三三年

(“Monthly Bulletin of Economic China” October, 1934.)

最堪注目的是，流入上海的白銀之大部分，原則上都集中在外國銀行手裏。一九三二年各外國銀行的銀準備，佔上海全存銀的四四・二%，一



九三三年則佔五〇・三%。蘇爾德也說，流入外國銀行的銀子，是爲了向外國輸出之用。

內地白銀向外流出，其結果是極其重大的。中國經濟雜誌於一九三四年正月號上說：『內地白銀之不斷的流出，使金融市場危迫，繼之使物價低落，對於全國工商業的大多數，都予以重大的影響。』

一九三二年，中國海關統計，就開始揭載有白銀的輸出，次年這個輸出是更加增大了。由下表可以知道，銀的輸出，在美國銀政策實行以前，已開始發生，這是原於爲抵償國際收支發生了許多內債的結果。華僑匯回中國的財源，既顯著的減少，而放款或投資形式的資本流入，又大大低落。因此中國對於國際收支的不足，只好吸盡國內的白銀資源（至於金

子，是無須說了），以資填補，這是非常明顯的事。中國對於外國商品的入超，是用貴重金屬的輸出即金銀的輸出來支付的。由內債及各種紙幣的發行，把現實的銀貨收集起來，這些銀貨則因抵償輸入品如武器，飛機，彈藥等的代價。流到外國商行之手，最後則輸出海外。

銀的輸入及輸出（單位百萬元）

	輸入	輸出
一九二九年	一六三·九	—
一九三二年	—	二·五
一九三三年	—	一四·五

一九三四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一·七	一·七	〇·八	一四·七	二·一	三·九

(“Monthly Bulletin of Economic China” October, 1934.)

上述的狀態，因羅斯福的銀政策，更加惡化，因之使中國白銀流出的過程，異常劇烈了。自從一九三四年八月，羅斯福發出白銀國有令以後，上海及其他大商埠的白銀，就開始『逃亡』，在這一年的八個月之中，輸



出了一億三千萬元，而八月一個月，則輸出六千六百萬元。白銀交易的投機熱，從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無分晝夜，上海各銀行，都把銀塊向海外輸送。這樣大量的白銀流出，使中國金融界大為吃驚了。中國政府對於羅斯福銀政策的態度，大部分要為反對提高銀價的中國金融家以及工商業家的態度所決定。中國的工商業者，因為銀價低廉，可以買得低廉的原料和賤價的勞動力，因此可以與外國商品的競爭作戰，當然要反對銀價的騰貴。中國銀行的總經理，對於羅斯福的銀政策，於是表明反對的態度。他在一九三三年度報告之中，關於中國的經濟狀況，有下面這樣的聲明，他說：『中國對於外國市場的購買力，並不在於用人為的方法，把銀價提高，而是要依靠中國能賣給外國多少商品以為定。』這個聲明，就是給美

國資產階級陣營中，那些主張銀價騰貴則中國的購買力也增加的『銀派』以回答。中國有力的財政家李銘氏，在紐約中國協會中，將此同一意旨，說得更爲尖銳，他說：

『流行的獨斷論據，都是說銀價低落，則中國痛苦不堪，其實完全不然。……有人說銀價騰貴，中國就可以在美國買更多的東西，而美國又可以在中國賣更多的貨品，這種理論，在經濟上沒有一點根據。』（“Financial News” 15. X 1934.）

這裏最顯著的事情，是中國的金融界與英國資產階級的見解完全一致。英國的蘇爾德氏，開始就反對銀價的騰貴，這就是說他反對美國的銀政策。他說，高的銀價，把中國由滙兌膨脹所得的利益，完全奪去了，又

說，中國的輸出，因之被『封鎖』了。

由於金融界的輿情，又得到英國銀行家明白的支持，中國政府於是決定對羅斯福的銀政策，講求許多對策。政府把二·二五%的銀輸出稅，提高到一〇%，更重要的是，把中國銀圓脫離牠的銀的基礎。關於這種方策的意義，以後再詳細敘述。中國雖然是帶着危懼之念來實行這個方策，雖然是在確信美國對於提高銀價的既定方針不能改變以後，才來施行的，但總之中國總是轉向『反羅斯福政策』方面了。

中美間相當激烈的質問，與此相隨的，有頻繁的外交文書往返，都證明『中美的友誼』，確有相當的不爽。本不願使中美關係惡化的中國政府，最初曾請求美國，當實施銀政策之際，最好把中國的利害關係加以一番考

慮。中國財政部長於九月二十四日致美國國務院的覺書上，曾說到美國的
提高銀價，使中國政府至感困難，銀價若再向上騰貴，『將予中國以重大
的損害，』並要求美國保證，應即『抑止使中國白銀外流的任意方策。』
到十月十二日才得到美國的回答，國務卿赫爾在回答中，申明購銀政策
將繼續實行，任何保證也沒有給予中國。這就是表明羅斯福的銀政策，將
不顧對中國的影響之如何，一定要繼續實行。

中國對於美國和緩銀政策的請求，既沒有成功，只好着手實行自己的
方策。這個方策的重心，便是：把二·二五%的銀輸出稅，提高到十%；
再規定這樣的補充：『若是倫敦白銀的理論平價與中國中央銀行所公定的
滙兌市價之間，發生差額之時，在輸出稅以外，再課以平衡稅。』這種方策

的實際效果，就是使中國銀元的匯價，從銀的世界價格的變動中，割離開來。換言之，即銀的行情，雖然考慮中國與倫敦市價的差額（這個差額，用平衡稅的方式來徵收，）但不問世界的銀價之如何。概由中央銀行來規定。因為這個理由，中國政府的方策，是向着兩重目的前進的。第一是把銀元與其銀的基礎切斷，第二事實上就是禁止銀的輸出。中國政府，同時在倫敦置有平衡資金，以作中國銀元對他國通貨，保持安定匯價之用。

這樣看來，中國已經建立了安定的外匯，對於銀子的外流，已經有穩固的對策了。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有望。第一雖然法令上禁止銀的輸出，然而對於廣大的私運，還沒有方法抑止；第二中國的國際收支，每年必須用輸出一定量的白銀，以清償外國。

中國政府，在考慮一個真正的幣制改革以前，牠不能不注意最能反映中國經濟困難狀況的國際收支現狀。上述方策的結果，使中國銀元浮在空中，究竟應依靠何種匯兌標準，則完全不知道（固然，一切的指標，都表示標準的鎊價）。英國的新聞 *Financial News*，極力攻擊羅斯福的銀政策，歡迎中國政府的方策，並預言中國銀元將有極『愉快的』前途。這個新聞上有這樣一段論述：

『拋棄了銀本位制的中國，現在為建立安定的銀元匯價，必須決定與一種標準締結起來。……據周知的前例，中國已在外國市場上，設立了統制自己匯價的『平衡資金。』這種平衡，是依據何種標準而存在的呢？牠應該依據金子呢？或者是美金，或者是金

鎊呢；我們以充分的根據來考察，牠正是要依靠金鎊。我們在最

近的將來，也許要歡迎一個新的重要成員，加入金鎊集團。」

(“New York Times” 2. VI. 1934.)

英國有力的經濟雜誌：對於中國政府十分同情。例如 *Economist* 雜

誌，根據倫敦金融界的意見，對於中國政府提高白銀輸出稅，有這樣的評論：『這是對於美國政策所造成的人爲的銀價提高，一種唯一可能的回答。』又說，英國之對中國寄與相當大的同情，是毫不足驚的……英國之對中國，不以善隣的態度相處，羅斯福大總統的條令，只知應美國銀派的要求，而把中國完全犧牲了。(“The Economist” October. 20, 1934.)

英國資產階級之所以對羅斯福銀政策不滿，是因爲在他們看來，這個

政策，是美國對抗英國向中國及印度輸出的一種鬥爭手段。

另一方面，銀價的騰貴，要使英國每年在中國失去白銀貢稅之一部。我們要知道，美國在中國的利害關係，是巨大的販賣市場，美國最近幾年間，在中國的輸入貿易中，佔着第一位，然而英國則是中國外債的大債主，中國對於這種債務，多半都是用銀子償付的。因此銀價高漲，對於英國帝國主義是沒有什麼利益的。也就是這個原因，英國對於美國的銀政策，加以猛烈的反對，在這個問題上，將保證英國對中國勢力之增大，將使中美聯繫減弱，英帝國主義將與中國資產階級緊緊握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6133B





中華民國廿六年七月拾壹日收到

